

# 從「剪桐封弟」兩種版本看上古 故事流傳與地域政治進程

于薇

中山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 摘要

「剪桐封弟」是一個關於西周成王分封的故事。文獻中存在封晉與封應兩個版本。封晉版在後世十分流行，封應版則鮮為人知。封應版始見於《韓詩外傳》，或可能出於荀子之說。封晉版始見於《呂氏春秋》。「剪桐封弟」故事的原生地域可能與應國相關，封晉版的出現，則是與春秋早中期之際晉南、晉東南區域政治快速發展的歷史進程相關。

關鍵詞：剪桐封弟、西周封國、應國、晉國

---

于薇，中山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新港西路135號，郵政編碼：510275，電郵：[yly0819@163.com](mailto:yly0819@163.com)。

本文係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中山大學重大項目培育計劃「南嶺歷史地理研究」（項目編號：13WKJC05）及2013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秦至宋環南海開發與地域社會變遷研究」（項目編號：13AZD035）的研究成果。

周成王天子無戲言，剪桐葉以封弟叔虞於晉，是關於西周初年封國分封最著名、最富戲劇性的故事，廣為流傳。但實際上，這個故事在文獻中有兩個版本，除封晉版外，還有一個不為人熟知的封應版。

當然，封晉版「剪桐封弟」影響比較大，見於多種史著，最有名的是〈史記·晉世家〉中的記載：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sup>①</sup>

其他版本，故事內容不變，只是有些敘述中促成其事的人由「史佚」換做了「周公」。

剪桐封弟的封應版也是記在《史記》之中，只是從前沒引起學者的足夠注意。其說載於〈梁孝王世家〉：

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sup>②</sup>

封應故事的結構與封晉故事高度相似，主人公都是成王、成王之弟及大臣，情節也均是遊戲中以桐葉假意行封，重臣進言玉成實封之事。

古史內容之形成問題，是在近代史學中備受重視的話題。尤其是具有完整情節的故事性文本，特別適宜用來探討文本內容的層累和流變、文本創作主體的身份、文本的時代性與地域性等問題。顧頡剛先生「層累的造成中國古史」說指出上古傳說的故事內容有明顯的層累過程，這個邏輯已被學界廣泛接受。但故事中一些具體的要素究竟如何演變，故事在傳播過程中受時間、地點、族群等因素影響時會呈現哪些形式等比較具體的機制性問題，顧先生當時展開得不很充分。而這些問題也不是說理能解決的，需要仔細的、較多數量的個案分析。每個個案的文本情況不一樣，有些適宜研究時間（或

<sup>①</sup>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卷39，〈晉世家〉，頁1635。

<sup>②</sup> 司馬遷，《史記》，卷58，〈梁孝王世家〉，頁2090。

者稱為時代）的影響，有些適宜研究空間（或者稱為地域）的影響。若想對上古故事的傳播和流變機制的細節形成認識，就需要有針對性，在各種不同類的個案研究積累基礎上，總結文本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特點。

這類的個案分析工作，以往以顧頡剛對孟姜女故事的研究為代表。<sup>③</sup> 劉志偉關於姑嫂墳故事的研究，則是90年代後具有典範性的案例。<sup>④</sup> 隨後，明清史、歷史人類學學者較多展開這類研究，而先秦史學者做得反倒相對少些。即使有，分析角度也存在一些差別。如許兆昌對《史記》中黃帝形象的研究，雖然實質上也是在分析故事流變的過程，但卻是從史學史的角度提問。<sup>⑤</sup> 無論如何，這些都是非常值得借鑒的成果。

在進行故事分析時，時間、空間是兩條基本的線索。顧頡剛在分析孟姜女傳說時，就已經將分析結構設計為縱的時間脈絡和橫的地域系統。劉志偉則進一步強調故事的流變過程是個時空統一的過程，強調分析故事變化時，要將其置於具體地域特定時間的權力運行之中。這種邏輯，也是我們理解上古故事流變的基本思路。

時空過程是具體的。現在我們熟悉的很多故事，在漢代定本之前，都曾存在過多個不同的地域性版本。每一種地域性版本的背後，都有一個相關的區域歷史進程。而故事在上古的流變，又是與傳統中國各主要區域的特性從出現到定型的整個過程相伴隨。「剪桐封弟」的兩種故事版本，最明顯的區別就是在地理內容上。所以對其進行分析時，故事流變與區域時空過程之間的關係就變得尤為重要。本文即希望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串聯其可能的流變過程，分析故事中地理要素與大歷史之間的關係。

## 一、「剪桐封弟」封應版之身世

應國始封君為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地位並不比叔虞低，只是封地距周王畿略遠，在「應縣」。〈續漢書·郡國志〉中「潁川郡·父城·應鄉」條

<sup>③</sup> 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顧頡剛編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24-73。

<sup>④</sup> 劉志偉，〈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墳」及其傳說〉，苑利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傳說故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357-378。

<sup>⑤</sup> 許兆昌、齊丹丹，〈試論清華簡《繫年》的編纂特點〉，《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

引杜預注曰：「應國在西南」<sup>⑥</sup>，《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sup>⑦</sup>，即現在的河南省平頂山市，屬於黃淮之間的汝水流域。

封應版的「剪桐封弟」歷來不受學者重視，張守節作《史記正義》時，直接將此條認定為誤記：

《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sup>⑧</sup>

張守節這個看法承自臣瓚。臣瓚在〈漢書·地理志〉「潁川郡·父城」條注中講：

《呂氏春秋》曰：「成王以戲授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國，非成王之所造也。」

臣瓚、張守節認為剪桐封應說不可信的理由之一是覺得《呂氏春秋》的記載更可信，理由之二是根據《汲冢古文》認為在西周之前已經有應國存在，所以應國不應該是成王所封建。但這兩個理由都多少有些問題。

首先，《呂氏春秋》雖然文本年代較〈梁孝王世家〉早，但從文獻性質看，畢竟不是史書，而是雜採戰國諸家之言而成，雖然可備一說，但單以其所記來否定他說，理由並不充足。所以同是給《史記》做注的司馬貞，就沒有直接認定此條為偽，而是提出可能別有出處。其在《史記索隱》中稱：

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sup>⑨</sup>

而且，封應說出現的年代也並不晚。今本〈史記·梁孝王世家〉正文為太史公所做，後附「褚先生曰」的內容則為褚少孫所撰，封應之說是載於

⑥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志20，〈郡國二〉，頁3424。

⑦ 司馬遷撰，《史記》，卷58，〈梁孝王世家〉，頁2090。

⑧ 司馬遷撰，《史記》，卷58，〈梁孝王世家〉，頁2090。

⑨ 司馬遷撰，《史記》，卷58，〈梁孝王世家〉，頁2090。

「褚先生曰」之內。雖然褚少孫是西漢末年人，時間較晚，但封應說之始創卻並不由褚氏，而是最早見於《韓詩外傳》。顏師古為〈漢書·地理志〉作注，引應劭《漢書注》，其中載《韓詩外傳》云：

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圭，「吾以此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是也。<sup>⑩</sup>

班固似乎也頗為重視這個說法，在〈地理志〉自注中，亦採韓詩說，云「應鄉，故國，周武王弟所封」<sup>⑪</sup>。一直到後來，酈道元在〈水經·淄水注〉中雖然不同意，但也還是載錄了這個說法。<sup>⑫</sup>

韓詩為西漢詩今文經三家之一，為韓嬰所作，其說在西漢影響很大。從〈漢書·儒林傳〉中即可看到西漢《韓詩》之傳承與盛行的情況：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賈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王中尉，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鮑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sup>⑬</sup>

<sup>⑩</sup>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卷28上，〈地理志〉，「潁川郡·父城」，頁1561。

<sup>⑪</sup> 班固，《漢書》，卷28上，〈地理志〉，「潁川郡·父城」，頁1560。班固此處「周武王弟」疑為「周武王子」之誤。《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前634）記有周初姬姓諸國始封君身份，稱：「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應國列於「武之穆」諸國之中，而「文之昭」諸國中也沒有應國，所以應國始封君是武王之子即成王之弟的身份素來沒有異議，故疑班固此處為不審之誤。

<sup>⑫</sup> 酈道元，《水經注》（光緒十八年〔1892〕思賢精舍刻本），第13冊，卷31，〈淄水〉，頁4。

<sup>⑬</sup> 班固，《漢書》，卷88，〈儒林傳〉，頁3613-3614。

韓嬰為漢文帝至武帝時人，學問精悍，頭腦清晰，不遜於董仲舒。韓詩內、外《傳》定為官學，其後由韓商、趙子、蔡誼、王吉、食子公、長孫順、張就、髮福等傳承，在漢代一直流傳有序。也就是說，《韓詩外傳》中剪桐對應的說法，至少遠早於諸少孫所在之西漢末年。而且，《詩》的今古文，各家傳說，師承多追溯至荀子。當然，自《漢書》以來，談得比較多的是古文毛詩與子夏的關係。〈漢書·楚元王傳〉云：

（楚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

顏師古注云：

孫卿姓荀名況。<sup>⑭</sup>

除毛詩外，今文魯詩由申公傳，漢時人也已知魯詩承自荀子。陸德明《經典釋文》云：

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sup>⑮</sup>

則指出毛詩也傳自荀卿。雖然此種說法的年代不早，根據並不是十分充分，並沒有得到學者的一致認可，但由於荀卿在稷下學宮有重要影響，而漢代詩學，與稷下之學也有密切的關係，所以還是不少學者認為此說有據。錢基博在《經學通志》中就秉承此說：

魯申公之學，傳自荀卿，而溯之子夏，於三家為有據也。魯國毛亨亦受學荀卿，以《毛詩》別自名家，自謂子夏所傳。<sup>⑯</sup>

學者又進一步比較今文詩三家異同，發現韓詩亦與荀子有密切關係。王應麟

<sup>⑭</sup> 班固，《漢書》，卷36，〈楚元王傳〉，頁1921。

<sup>⑮</sup> 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1，〈敘錄〉，頁38。

<sup>⑯</sup> 錢基博，《經學通志》（上海：中華書局，1936），〈詩志〉，頁93。

在《困學紀聞》中即稱：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sup>17</sup>

嚴可均在《鐵橋漫稿》中也談到：

《韓詩外傳》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餘事，是韓嬰亦荀子私淑弟子也。<sup>18</sup>

王應麟、嚴可均可視作一流學者，二人認為《韓詩》出於荀子，可備一說。若如此，那麼這個故事的流行至少可以上推至戰國晚期，從年代上看，甚至比《呂氏春秋》還要早一點。

臣瓚、張守節認為封應為偽說的另外一個理由是根據汲冢書，商時就已經存在應國，所以不該是周成王所封。但即便應國是古國，也不等於西周應國就是古國的延續而不是周人新建。西周克商以後，在一些舊地分封建立諸侯國時，會沿用當地原來的地名。例如河南信陽地區的息國，根據羅山天湖墓地出土的銅器銘文可知，其地在晚商應為「息」國（或至少存在息族）。<sup>19</sup> 西周立國後，又封姬姓於此，亦稱息國。<sup>20</sup> 若只從國名看，息確實古已有之，但並不等於西周的息國不是王室新封。還有山西南部的虞、芮兩國，從文獻可知，均為古國，入周後又都再封為姬姓國。所以，西周的虞、芮兩國與曾經的虞、芮古國雖然名稱相同，地點可能也有關係，但亦非簡單的古國延續。

這樣看來，臣瓚、張守節雖然態度明確，依據卻不是太充分，恐怕也只是對這一問題多種理解中的一種。但由於臣瓚的注被顏師古重視，多加引用，而顏注歷來被認為精駁允當，自北宋淳化刊本以來，通行《漢書》基本

<sup>17</sup> 王應麟，《困學紀聞》（《四部叢刊》三編本），卷3，〈詩〉，頁23。

<sup>18</sup> 嚴可均，《鐵橋漫稿》（道光十八年〔1892〕四錄堂刻本），卷3，〈文類一〉，頁3。

<sup>19</sup> 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河南羅山縣蟠張商代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又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羅山蟠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二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又〈羅山蟠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三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又河南省信陽地區文管會、河南省羅山縣文化館，〈羅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

<sup>20</sup>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三訂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息〉，頁351-353。

皆與顏師古注合刻，故影響甚廣。同樣，張守節《史記正義》作為三家注之一，自北宋元祐年間官本起（另一說自南宋紹熙、慶元年間黃善夫刻本起），便一直與《史記》合刻，<sup>②</sup> 明代南北監本、清代武英殿本等官本皆為三家注合刻，<sup>②</sup> 其注文幾乎被與太史公所書視為一體，少受懷疑。所以，將剪桐封應故事視為偽訛的看法也影響甚遠。

至近代，校讎名家向宗魯先生傾向封應不見得是誤說，未必封晉之說就可信，稱「予謂據《左氏傳》，晉與應同為武之穆，則唐叔、應侯皆成王弟，（〈地理志〉顏注說）未審孰為得實也。酈氏以殷之應為周之應，則郢書燕說矣」。<sup>③</sup> 酈道元《水經注》中「剪桐封弟」兩種說法都有引用，但亦同意臣瓊看法，向宗魯先生否定酈道元的說法，也即是否定臣瓊的認識。

無論如何，西周應國是周初始封的姬姓國家。其國分封與發展的歷史，文獻中記載很少，從前只能在傳世的銅器銘文中看到一些蛛絲馬跡。近年來，隨着平頂山滍陽嶺墓地的發掘，銅器銘文材料越來越多。黃益飛對傳世的20件、發掘出土的51件及流散的13件總共84件應國有銘銅器從器形、紋飾和銘文角度進行類型學排隊，並結合滍陽嶺墓地的材料，認為「屬應國國君器的傳世具銘銅中，應公尊 A 屬成王時期，器主當即應國的始封君應公 I」。<sup>④</sup> 從銅器銘文來看，封應的時間大致在成王時期。

李學勤對保利博物館藏西周中期的禹簋銘文進行研究時曾指出，應國與王室的關係非同尋常。禹簋銘文云：

惟王十又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姑。王弗忘應公室，汎室再身，賜貝卅朋、馬四匹。再對揚王丕顯休室，用作文考釐公彝。其萬年用，夙夜明享，其永寶。（近出·485）<sup>⑤</sup>

李家浩先生已指出，其器主即應國墓地84號墓所出簋銘的應侯禹。李學勤先

<sup>①</sup> 翟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90）；森立之等編，《經籍訪古志》（臺北：廣文書局，1981）。

<sup>②</sup> 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sup>③</sup> 劉向撰，向宗魯校正，《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1，〈君道〉，頁9。

<sup>④</sup> 黃益飛，《應國具銘銅器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未刊碩士論文，2010）。

<sup>⑤</sup> 劉雨、盧岩編著，《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第2冊，頁369-370。

生指出，「簋銘所說應公，是應國始封之君，周王不忘應公的後裔，賞賜了禹，就像賜予朝內的臣下一樣，這種情形在西周是很罕見的」<sup>㉙</sup>。「王弗忘應公室」雖然短短一句，其中卻頗有意味，似乎表達出王室與應國公室之間存在某種特別關係和深厚淵源。這種特殊性，很可能是與其所在地域在西周初年的重要性相關。這一點，我們在後文會進一步闡述。

## 二、「剪桐封弟」封晉版本之疑竇

再看西周晉國分封的故事。最早見於文獻的晉國分封故事不是剪桐封弟，而是上帝授晉國於叔虞；最早記載晉國分封故事的文獻，也不是《呂氏春秋》，而是《左傳》。故事所述，也並非剪桐封晉。

故事載於魯昭西元年（前541），是由鄭國執政子產講與晉國執政叔向聽的。當時晉侯有疾，鄭相子產前去聘問。當時卜人卜問晉君病情，結果顯示為實沈、臺駘作祟。晉國史官不知此為何神，而子產以博學聞於當世，故叔向請教之。子產解答，稱實沈為高辛氏之季子，居守大夏之地，身後主參星；臺駘則是金天氏之後裔，封於汾川，為汾神。二者都是曾經掌管過晉地的上古人物。講述中，提到了晉國始封之事：

（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sup>㉚</sup>

這段敘述十分醒目的特點就是根本沒有提到剪桐之事，而是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邑姜夢帝授唐於其子虞。當然，子產當時的這段話，主要是想指出晉為參星分野，以此解釋卜人為何會卜出與實沈相關。但從中可以看出，在春秋晚期，對於晉國始封的情況，存在着一個與後世家喻戶曉的那個剪桐封晉完全不同的故事。而且，子產是鄭國人，也就是說，這個故事的流傳頗廣，在周王室的其他封國中也為人知曉。

<sup>㉙</sup> 李學勤，〈探尋久被遺忘的周代應國〉，《文史知識》，2010年，第11期，頁11。

<sup>㉚</sup>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影印本），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41，頁2023。

而司馬遷在〈晉世家〉講述剪桐封晉故事之前，也記了這個故事：

晉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sup>㉙</sup>

這種權力神授的故事，在春秋時期似乎是一個頗為流行的模式。春秋文獻中不止一次出現類似內容。譬如魯三桓中季氏始祖公子友降生的故事，就幾乎與叔虞完全一樣。《左傳》閔公二年（前660）載：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問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sup>㉚</sup>

都是未生而預知其名，都是未生而知其所封與政績，都是及生而掌紋上有名正合於預言。這種結構，透露出這種文本的「故事性」與「創編」痕跡。無獨有偶，鄭穆公子蘭降生的故事的結構也十分類似：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儻。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微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sup>㉛</sup>

大抵當時比較流行以此種故事來宣揚顯赫人物的神奇來歷，以天命作為其權利的合法性。司馬遷確實對這類故事很感興趣，〈史記·鄭世家〉中也採信了這個說法。

所以，看起來子產所講更像是一種在春秋晚期人們十分熟悉甚至有點老

<sup>㉙</sup> 司馬遷，《史記》，卷39，〈晉世家〉，頁1635。

<sup>㉚</sup>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11，頁1787。

<sup>㉛</sup>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21，頁1868。

套的劇情故事。子產是否真博學，不得而知。但子產並非晉人，未必熟知晉國歷史。在被問詢的情況下，並非沒有胡亂講故事的可能性。而叔向面對這樣位高權重又負有盛名的國賓，即使心中有所懷疑，也不會直接揭穿。

有趣的是，在〈國語·晉語〉中，還恰恰記載了晉國的公族、當時的執政叔向對晉國始封原因一個完全不同的說法：晉平公射鶡，沒能射死，便派近侍去捉，又未能捉住。平公惱怒要殺近侍，叔向前去勸阻，責備晉平公全無先祖之武功，卻又想任性濫殺。平公聽後感到羞愧，放過了近侍。叔向在勸阻晉平公時這樣說道：

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sup>③</sup>

叔向與子產是同一時代的人，在當時也有博洽君子之名，這段話是他對本國國君講述本國始封先祖受封事蹟，以批評其失德之舉，應該不會隨意亂講。而且，叔向後面還用十分譏諷的語氣對平公說，「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鶡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相當不客氣。平公作為一國之君，常習宗廟祖先之祭，必然會在祭樂頌詩中經常聽到先祖始封事蹟，若不知叔虞因善射而封侯，又怎會因叔向之說而呈「忸怩」之態，乖乖赦免了近侍。所以，春秋晚期晉國公室自己所講的先祖故事中，叔虞獲封的契機，不是天命所歸，而是武功超群取悅了成王。

更重要的是，在春秋的文獻中，無論是子產還是叔向，誰的說法中都沒有「剪桐封弟」這一幕。這就不得不令人懷疑剪桐故事封晉版在春秋時是否存在。

前面已經提到，剪桐之說始見於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卷18〈審應覽·重言〉：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sup>④</sup>

<sup>③</sup>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晉語八第十四〉，頁427。

<sup>④</sup> 呂不韋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8，〈審應覽·重言〉，頁1166。

這其實是關於晉國始封原因完全不同的一種解釋。這個文本的年代，與《左傳》、《國語》間隔了幾乎整個戰國，期間沒找到其他文獻可以用來分析。所以，剪桐封弟的封晉版究竟何時初現，又如何替代了帝授唐於叔虞成為晉國以外流行的版本，以及是否同時也替代了晉國公室內部武功封侯的版本，暫時還不得而知。但顯然，到了司馬遷著《史記》時，帝授版和剪桐版都流傳甚廣，而太史公並沒有做出取捨，而是並存二說，把兩個故事硬生生給捏合在一起了。

從晉國分封故事的流傳和變化來看，帝授天命的故事文本年代較早，且故事情節中包含有比較明顯的軍事內容，強調舊唐國的滅亡是晉獲封的契機。而剪桐封弟，則強調晉國受封的機緣非比尋常，始封君與周成王之間的關係十分親密，相對其他封國有特殊性。這兩種先後不同的傾向之間的區別，也很可能是與其所在地區兩周時期的政治進程有一定關係。這一點，我們也留待後文再說。

### 三、「圭」：故事中的一個突出意象

與封國神授相比，剪桐封弟的故事無疑有更明顯的道德教化意味。故事中的兩個主要人物，都承載政治道德意象。在成王，是要宣揚君權的權威，以及在行使過程中的信譽。在周公（或者史佚），則是彰顯人臣要及時提醒君王正確的為君之道。但在整個故事中，還有一個突出的情節值得注意，即少年天子剪桐葉為圭。從故事一般的敘述結構來分析，這類情節與故事傳播過程相關。或是在故事創始之初就存在，往往帶有特定的象徵意味，與故事中某些隱晦的內容相關。或是在某一關鍵變化的環節中出現，對於影響變化的時間或者地域帶有一定的指向性。

雖然剪桐故事的早期文本除了《呂氏春秋》之外我們還沒找到其他的，種類不夠豐富，不便於比較，我們暫時還無從判斷這是否是故事的原生情節，但不得不承認，與其他分封故事相比，這個情節無疑是特殊的。比如《左傳》定公四年（前506）中也記有對晉分封時情況的一種描述，曾談到所獲之寶器，稱「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沽洗」<sup>③</sup>。唐叔就是叔虞，所得中大路為車，闕鞶為鎧甲，沽洗為樂鐘，再加上密須所出之鼓，其中就完全沒談到剪桐，也沒談到有圭。這樣看來，這個剪桐為圭的細節，至

---

<sup>③</sup>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54，頁2135。

少在春秋末年還沒被與晉國分封相關聯。那麼，不論是封應版還是封晉版，這個細節有什麼深意，在分封故事裡可能的意象是什麼，就值得我們進一步發掘。

圭是玉禮器的一種，等級頗高，在西周的政治生活中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周禮·地官·掌節〉載掌節之官負責保管天子的各種符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鄭玄注云：

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

孫詒讓《正義》進一步解釋：「行者所執之信，王使傳命於四方，慮人不信，又各以其節輔助之，亦所以絕矯誣而昭明信也。」<sup>34</sup>根據《周禮》的說法，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這幾種玉禮器，是執行天子之命用以為信的憑證。天子委任官員在外行使權利，必得以此為信物，所封之官才能獲得相應的權利。

〈掌節〉中所列邦節有五種，其功能各有不同。〈周禮·春官·典瑞〉中有具體記載：

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守兵。……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其中牙璋是天子調用諸侯的兵符，穀圭是調和諸侯之間矛盾以及聘女納徵的信物，琬圭是天子嘉獎有善政諸侯的獎牌，珍圭、琰圭則是代天子征守、鎮恤、懲惡令善的憑證。<sup>35</sup>鄭玄特別提到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征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是王官行使王命的重要憑信。杜子春則認為「珍」當為「鎮」，若真如此，則珍圭恐怕不僅是往致王命，很可能兼有代王鎮守之意。這樣看來，有了這麼複雜的內涵，從讀故事的角度，不僅可將其解讀為

<sup>34</sup> 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28，〈地官·掌節〉，頁1111-1112。

<sup>35</sup> 詳見〈典瑞〉注疏及正義。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卷39，〈春官·典瑞〉，頁1594-1602。

信物，也可以解讀為領有某種出鎮的使命。

從《左傳》中看，春秋時講到晉受封時所得，我們沒有看到圭。應國封封是否獲圭，文獻中沒有相關說法。但從史事的角度，周初應國分封的情況確實比較特殊。在銅器銘文中，可以看到應國中存在一種比較特殊的身份，叫做「應監」。1958年，江西余干縣出土「應監甗」，銘文有：

應監作寶尊彝。（集成·883）

「監」這種身份，在傳世文獻中有載，周初設「三監」以監殷民，後三監叛亂，周公平叛，繼而東征。因此，「三監」在西周史中非常著名，且存有管叔、蔡叔、霍叔和管叔、蔡叔、武庚不同說法。但傳世文獻中沒有與應國相關的監的記載。「某監」辭例，在銘文中亦屬罕見。所以此器一出，「應監」之「監」便引起學者的興趣。郭沫若〈釋應監甗〉認為：「作器者自稱『應監』，監可能是應侯或者應公之名，也可能是中央派往應國的監國者。」<sup>36</sup>此說實際上是提出了兩種可能性，一種以此器為應侯器，但「監」並無特殊含義，是應國君的私名；另一種是認為此器非應侯器，監有監察、監國之意，應監是中央駐派應國的監查官員。郭沫若傾向後者，之後學者也多承郭說。<sup>37</sup>

顧頽剛則認為，「『應監』似乎即等於稱『應公』或『應侯』」。<sup>38</sup>任偉則提出，周初監國制度，從三監的例子看，是在外監之，即以諸侯監諸侯，而不是秦漢以後王朝派駐官員所謂在內監之的做法。<sup>39</sup>若真如此，那銘文中所謂「應監」，就不應是王朝派駐監察應國之官員，而是應國本身，也就是當時應國國君應公。其說不是僅就銘文談銘文，而是對照傳世文獻之例，有一定道理。

<sup>36</sup> 郭沫若，〈釋應監甗〉，《考古學報》，1960年，第1期，頁7-10。

<sup>37</sup> 關於西周諸監制度，學者多有討論，在此不另展開。參見李學勤，〈應監甗新說〉，《江西歷史文物》，1987年，第1期；耿鐵華，〈應監甗考釋〉，《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6期，頁68-71；伍仕廉，〈論西周初年的監國制度〉，載人文雜誌編輯部編，《西周史研究》（西安：人文雜誌編輯部，1984），頁120-130。

<sup>38</sup> 顧頽剛，〈「三監」人物及其疆地——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一〉，《文史》，第22輯（1984年），頁4。

<sup>39</sup> 任偉，〈從「應監」諸器銘文看西周的監國制度〉，《社會科學輯刊》，2002年，第5期，頁102-105。

應監廟的年代，朱鳳瀚先生定為成王時期，時間也與應國始封君器「應公尊」的年代一致。之前所引李學勤先生之論述中，李先生指出非常重要的一點，天子對禹的賞賜「就像賜予朝內的臣下一樣」，銘文與王畿地區常見那種天子依據其祖先功績策命王朝官員承襲世職的策命金文十分類似，有明顯的申就乃命、以授王官的意味。將這些材料綜合起來看，應國在周初的身份，除了是封國之外，還是司監之王官。如此，則非常貼近周初「監」的職能。

這樣看來，剪桐故事中「圭」這一細節很可能存在某種政治含義。若從意象的角度考慮與故事原生地域的關係，則應國始封時的特殊身份，更容易引發聯想。

#### 四、無關真偽：歷史進程下的分封故事

從以上論述來看，似乎本文更傾向於剪桐封弟最初是與應國相關的故事，而剪桐封晉可能是個偽故事。但本文要談的並不是真偽的問題。不論故事是否原生於應國，還是周天子是否真的剪桐封應，都不是本文想要討論的問題。上古故事材料稀缺，這樣少的資訊，也根本無法支援真偽問題的討論。如開篇所講，本文關心的，是通過對這一故事兩個版本的梳理和分析，嘗試觸及先秦時期歷史敘述的文本在形成、流變方面的一些特點，特別是與地域發展的關係問題。

黃淮之間和晉南、晉東南地區這兩個區域，在西周、春秋、戰國有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西周時期，王朝重視洛陽以南黃淮之間的地區，在這裡派設封國，由王朝主導的開發成為這個地區西周歷史進程的主流。顧頡剛就曾經談過，「管叔先封於管，蔡叔先封於蔡，和封於魯山的伯禽，封於臨汝的康叔，都在今河南省黃河之南，除管外都在汝水流域」。<sup>⑩</sup>成王時封蔡、陳等於其地，但蔡屬於曾經叛亂之國，陳也不是姬姓，為了確保這個重要地區的有效控制，必得有與天子關係密切的親戚之國來藩屏監控。故成王封親兄弟於應，而且很可能命之為監，授予監視、鎮守、懲惡、嘉善之權，保障這個地區穩定的意味比較明顯。

而晉南、晉東南在西周則不同，在成康以後，王朝並沒有對這個地區投入太多精力，這個地區西周歷史進程中主要的特點是面對周圍大量戎狄，分

<sup>⑩</sup> 顧頡剛，〈「三監」人物及其疆域——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一〉，頁8。

封在此的周人，奮揚武力，謀求自保。所以，任偉就曾談到過，「唐叔虞之所以得封晉國的原因，並不像某些文獻記載所言的是『因夢而封』或『桐葉封侯』，其主要原因應是周王室『選建明德，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之結果，而能騎善射、業已成年當是受封的前提條件」。<sup>⑪</sup> 戰國文字中，「唐」、「桐」兩字的寫法十分相近。張頷也提出過一種觀點，認為「剪桐」是「剪唐」的誤寫，可能是晉國軍功故事的訛變。

被封者的地位，是拆解故事流傳時空邏輯的關鍵。故事最初流傳之地可能在應，應國作為一個姬姓小國，這樣一個始封故事不論真實與否，都能夠強調出一種非同尋常的特殊身份。而西周到春秋前期其所在地區在政治、軍事上的關鍵性，也為這個似是而非的故事提供了土壤。

而進入到春秋以後，周王室力量衰落，晉國異軍突起，晉南、晉東南進入到由晉國主導的快速發展階段。而同時，淮河上游失去了王朝的庇護，諸多小國迅速衰落下來。黃淮地區失控的趨勢，在西周晚期即已顯現。這個地區族群關係複雜，在西周時，因為有王朝力量的庇護，各個小封國軍事上的壓力不大。但隨着春秋王朝勢力的衰落，淮夷侵擾日甚，楚國也強勢東出。應國在春秋時期即無聲無息地滅亡了。應滅國的具體情況目前不太清楚，但是在這樣一種大趨勢下是無疑的。而春秋時期的晉南、晉東南卻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晉國依靠武力解決了周邊的戎狄問題，並勢力迅速發展且成為中原諸國的霸主。

在這樣的時代，強大起來的晉國需要一個神聖故事，來取代周初始封之時的小國記憶。在春秋末年，剪桐封應的故事在魯地被納入經典之中，此時受封者的身份實際上被弱化了。若《韓詩外傳》與子夏之間有一定關係，則其講授者身份是春秋戰國之際的儒家，成王天子無戲言的德行是儒家強調的意義所在。到了漢代，因為故事內容合於帝王之道，不僅司馬遷《史記》中，劉向《說苑》中也加以宣揚。<sup>⑫</sup> 此二書均將此故事歸於叔虞，封晉說也便成為了人們熟知的故事，封應說在文獻中就越來越罕見了，晉因武功而受封的版本也逐漸漫漶了。

<sup>⑪</sup> 任偉，《西周封國考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92。

<sup>⑫</sup> 劉向撰，向宗魯校正，《說苑校證》，卷1，〈君道〉，頁9：「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頌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如果剪桐封弟故事的原生地在應，而後流傳的過程中被偽訛為晉的故事，則整個趨勢基本與時代大的地域發展進程相一致。雖然這個故事的文本版本、相關文獻都不是很豐富，但從上古故事的遺留幾率上來看，有這樣兩個對照鮮明的故事供我們探討，已屬不易。限於材料的緣故，我們暫時還無法再進一步將故事演變放入具體的歷史場景之中，分析導致變化的細緻權利關係，更無法還原故事演變過程中的人和事，但這種努力不能放棄。

( 責任編輯：唐金英 )

# Geopolitic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Tales: on two Versions of the Story of “Using a Cut Leaf to Enfeoff His Younger Brother”

Wei YU

Centre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 Abstract

“He used a cut leaf to enfeoff his younger brother” is a legend about King Cheng of Zhou (11th century BCE). Two versions of the story are found in the literature. They differ on the domain with which the young king enfeoffs his brother; in one version it is Jin and in the other Ying. The former version became extremely popular over time while the latter largely disappeared from circulation. The Ying version may have appeared first in the *Hanshi waizhuan*, a concordance to the *Book of Odes*, or it may have been first recorded by Xunzi. The Jin version stems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story probably originated in the Ying region, while the subsequent popularity of the Jin version owes mor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Jin region in the early to mi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Keywords:** Western Zhou, Ying state, Jin state, enfeoffment

---

Wei YU, Centre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Province, P. R. China. E-mail: yly0819@163.com.